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语言交融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张 彤◎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中的广义外来词统计研究”

(项目批准号13YJC740140)

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汉语欧化状况多视角研究”(项目批准号CUC13B12)

语言交融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张 彤◎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交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张彤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57—1692—8

I. ①语… II. ①张… III. ①现代汉语—语言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IV. ①H109.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047 号

语言交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YUYAN JIAORONG JIQI YINGXIANG YINSU YANJIU

著 者 张 彤

责任编辑 李水仙

封面设计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692—8/H·169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于根元

张彤的著作《语言交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写成了。

张彤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

张彤报考我的研究生前，只是来咨询了一下。她当时是确定要归并到中国传媒大学来的矿大东校区的一名外语系老师。那时，我想建立一支由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的学术队伍，外语出身的人还是要考虑的。外语很好的人如果对汉语比较重视、对汉语研究也比较熟悉的话，那是有自身优势的。当然，对汉语出身的人来说，也应该重视外语、熟悉外语研究。我觉得张彤还符合条件，就建议她报考了。后来，金恩净、李娜、谢爱伟都是外语出身的，金恩净还是韩国人，我都要了。

在张彤写博士论文之前，我正好读到一本书，大意是说世界上的语言有的比较开放，有的比较保守，汉语是比较保守的。我想了许多问题，例如是汉语比较保守呢还是使用汉语的人比较保守，是使用汉语的人一直比较保守呢还是有时候是很开放的，是汉语跟形态等差别很大的语言交融比较困难呢还是汉语跟所有的语言交融起来都比较困难呢。其中的关键是汉语还有没有救治的可能。当然，后来我认识到世界上的语言不分先进和落后，只是有的比较先进一些，汉字汉语就属于比较先进之列的，而且相当先进。这些是后话。

我当时建议金恩净的博士论文研究汉语新词语进入韩语的情况。金恩净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好。她研究了起码一百多个在韩语里用得很多的汉语

新词语。我建议张彤的博士论文能对汉语跟外语尤其是英语交融的情况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那时候张彤的身体很不好，腰疼得很厉害，不过她的博士论文最终还是完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张彤的书稿，考虑的还是她的博士论文的问题，但是已经跟她的博士论文很不一样了。

我没有细看张彤的这本书稿，只是简单翻阅了一下，可以看出，一是，张彤的进步很大很快，这部书稿完全可以出版。二是，张彤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这本书稿的意见不是我都赞成的，例如她同意适者生存的理论，而我很不赞成。这样的情况很多。但是学术重在交流和讨论，不需要都根据我的意见来修改，我的意见也在发展。三是，我说的语言交融，还有广阔得多的意思，而且是十多年以前的想法了，现在大体上又进步了。我的兴趣太广，而且不是语言学所能包容的。再说，我已经退休多年，早已从语言学淡出了。

我建议张彤今后的研究路子可以更广阔一些。这样，能够举一反三，也能举三反一。而且可以站得更高一些看问题。

序 于根元 / 1

第一章 语言交融引论 / 1

第一节 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变化与类型 / 1

第二节 语言交融题解 / 4

第三节 语言交融的哲学透视 / 7

第四节 研究构想 / 16

第二章 语言交融研究背景及概况综述 / 24

第一节 19 世纪前:萌芽和材料积累阶段 / 24

第二节 19 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语言学、方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基础上的
多学科理论构建 / 36

第三节 19 世纪以来中国:西学东渐引发的语言交融研究 / 61

第三章 关于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中外来词量的统计研究 / 88

第一节 统计目的和词表选择 / 88

第二节 统计涉及的外来词范围 / 91

第三节 基于 8821 常用词表的外来词统计结果 / 97

本章附录:排除鉴别依据⑧单独覆盖的 85 条日源借词后的统计结果 / 134

第四章 语言交融的影响因素 / 136

第一节 结构因素 / 136

第二节 地理因素 / 160

第三节 社会因素 / 167

第四节 影响因素小结 / 173

第五章 语言交融能力的启示 / 176

第一节 语言优劣论证伪 / 176

第二节 汉语交融能力对语言政策的要求 / 179

第三节 语言教育对语言竞争的影响及现实中的认识误区 / 184

第四节 交融中的语言规范化 / 189

第六章 结语 / 193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194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之处 / 199

附录一 基于 8821 常用词汇的外来词统计词表 / 200

附录二 正文图表索引 / 238

参考文献 / 242

后 记 / 251

第一章

语言交融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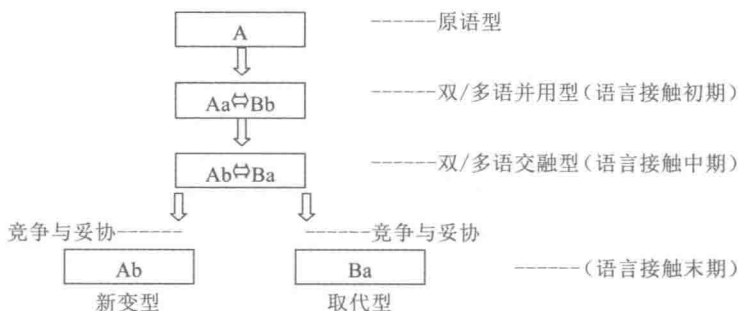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变化与类型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六千多种语言,古往今来,语言的接触始终伴随着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不同语言之间不断发生着相互影响和渗透,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变化状态或关系,既有语言间词汇的输入与输出这种常见的现象,也有皮钦语、克里奥尔语这样的混合语,还有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的情况。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一直为语言学家们所关注。例如,早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海牙,1928),就有学者提出必须区别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的语系(language family)与无亲属关系但因互相借用而在语法和语音结构上相似的语言联盟(sprachbund)这两种不同现象;相邻语言的语音区、语言干扰问题为第四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所关注;双语现象的内部结构问题、底层(substratum)、表层(superstratum)和附层(adstratum)^①语言成分的作用等问题为第五届国际语言

① superstratum 和 substratum 的定义见 Crystal(1991:295,296),本书采用国内学界较为常用的译法。商务印书馆编译的两部语言学词典译法不同:沈家煊译为“上位层”和“下位层”(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345,346);陈慧瑛译为“上层语言”和“底层语言”(哈杜默德·布斯曼,2003:533,535)。对于 adstratum,沈家煊译为“接加层”(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0-11);王素梅,彭国跃译为“傍层”(真田信治等,2002:67);陈慧瑛译为“附层语言”(哈杜默德·布斯曼,2003:7)。本文承接“表层”和“底层”的译法,参考陈慧瑛的译法,译作“附层”。

学家会议所关注；一种语言的形态体系对另一种语言的形态体系影响的范围问题是第六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所关注的；不同语言的体系间相互渗透的问题则成为第十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关注的重点内容，等等。“接触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又一新兴分支学科的术语，在1979年布鲁塞尔的第一次国际语言接触和语言冲突大会上应运而生。

对于语言接触可能产生的结果，学者董仲司^①提出了“取代型”和“新变型”两个语言接触演进类型图，台湾学者李仲民(2004)将其合并为图1-1。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本土或土著语言A是理想化了的语言状态，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不含其他语言成分的纯种语言，现实中的语言往往含有多种语言的成分，因此实际语言接触产生的交融语言往往是A_{bc}……、B_{ac}……或C_{ab}……等形式的，例如仅就词汇而言，汉语中有英语、日语、俄语等词汇，英语中有德语、法语、拉丁语等词汇。



说明：

- (1)“A”表示本土(或土著)语言，A语言可以拥有a₁、a₂、a₃……a_n等语言成分，简称为“A_a”。
- (2)“B”表示外来语言，B语言同样可以拥有b₁、b₂、b₃……b_n等语言成分，简称为“B_b”。
- (3)“Ab”表示本土语言被B语言影响而具有B语言的语言成分。
- (4)“Ba”表示外来语言被A语言影响而具有A语言的语言成分。

图1-1 李仲民(2004)的语言接触与变化模型

① 董仲司：《闽南话的南迁及其语言接触之一例——再论海康音系的保守和新变》，第八届闽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海口，2003年。

这一理论模型适用于基于一种语言(无论取代与否)、包含少数异质成分的语言接触情况,但没有显示皮钦语、克里奥尔语这样介乎两种(或几种)语言间的混合语。克里奥尔语常常以某种(或几种)语言的词汇为词汇,以另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为其语音和语法,并成为某些人的母语。如,菲律宾的查瓦卡诺语(Chavacano)使用的是菲律宾语语法、西班牙语词汇;斯里兰卡的克里奥尔马来语(Sri Lankan Creole Malay)使用的是斯里兰卡摩尔泰米尔语语法、马来语词汇;吉普赛的罗马尼语(Romani)使用的是印地语语法,词汇来自欧洲不同语言;爪维语(Javino)拥有爪哇语语法、西班牙语词汇;波丢语(Petjo)拥有马来语语法,词汇来自荷兰语;我国四川雅江倒话使用的是藏语的语音和语法、汉语的词汇(吴安其,2004)。

因此,假如语言 A 与语言 B 接触,根据数学的排列组合,会产生以下三种结果(表 1—1):

表 1—1 A 与 B 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变化与类型

语言接触模式	语言交融 (language diffusion)	语言混合 (language hybridization)	语言融合 (language fussion)
语言变化	借用 (borrowing / loan)	混合语 (mixed / hybrid language)	语言转用 (language shift)
语言类型	A→Ab; B→Ba	ab/ba	A→Ba 或 B→Ab

(1)两种语言各自吸收对方的某些成分、形式、特征或要素,即语言间的借用(borrowing / loan): A→Ab; B→Ba。本书称这种情况为“语言交融”(language diffusion)^①。

(2)发生“语言混合”(language hybridization)而产生新的混合语

① 《历史与比较语言学词典》将“diffusion”定义为“一种语言形式或语言变化在跨越一定地域的语言变体中的传播,尤其是当这种传播跨越语系的界限时”(Trask, 2000: 91—92)。“diffusion”常被译作“扩散”,这一术语在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于历史语言学家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的波浪说(Wave Theory)语言传播理论。

(mixed/hybrid language)——皮钦语或克里奥尔语:ab/ba^①。

(3)原先的语言被另外一种语言取代,即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②,使得取代者成为表层,被取代者成为底层:A→Ba 或 B→Ab。本书称这种情况为“语言融合”(language fussion)。

就术语而言,“语言交融”与“语言融合”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交”,指语言间的交流、影响或渗透,其结果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后者侧重于“合”,指语言个体之间的合并或取代。“语言交融”是不同语言或方言共生的结果,“语言融合”是不同语言或方言竞争和一体化发展的结局。

第二节 语言交融题解

“语言交融”也就是语言间的“借用”^③,指语言之间成分、形式、特征或要素的交流。一说到“借用”,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借词”,但借用所涵盖的远远不只词汇这一个方面,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这种错觉,本研究使用“语言交融”来涵盖语言借用的方方面面。语言间的交融或借用包括输入和输出两个方向:一方面指某一语言消纳、吸收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成分、形式、特征或要素,另一方面指该语言的成分、形式、特征或要素进入其他语言或方言。语言成分、形式、特征的交融主要表现为语言或方言间语音、词汇、语法、语义

① “对于某一具有混合性的语言,是认定为原来语言的演变,还是认定为另一语种,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语种的认定并非语言学单一标准——而是一个民族学或文化学,乃至政治学问题。语种的规定性,绝不简单等同于语言之间的差异度,而是取决于语主的文化心理认同度。两种差别迥然的语言,基于文化心理的一致认同可以确定为同一种语言;而两种差别微殊的语言,由于文化心理的拒绝认同则必须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李葆嘉《汉语的祖先》译序,王士元,2005:70)。因此无法标明 ab/ba 属语言 A 还是 B。

② 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国外语言学通观》译为“语言转变”,指“从对某种语言的使用转移到对另一语言的使用的过程或结果”(李延福,1999,下:723),有的著作译为“语言换用”(如李葆嘉主译《汉语的祖先》)。“language shift”是语言使用主体——人的行为,而“语言转变”容易使人忽视语言使用主体,仅以为是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语言换用”则容易使人产生变换使用两种语言的错觉。因此本书采用“语言转用”以突出语言使用主体放弃原先的语言转而使用另一语言。

③ 语言的借用现象不局限于词汇的借用,也包括各种语言结构层次上的语言形式的引进(徐大明等,1997:167)。

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词汇交融往往表现最为显著;语言要素的交融主要表现为语言或方言间语言文化(如典故、隐喻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语言交融有内外两个层面:跨语种的输入和输出与一个语种内部跨方言的输入和输出,本书所探讨的内容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语言交融伴随着人的交流在语种和方言之间不断发生着,尽管交融会带来良莠不齐的新成分,但主流是好的,是伴随科技和文化的进步而产生的。从主流方面来说,语言交融是语言系统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交际的需求。不能跟不上发展需要、不能满足交际需求的语言,会面临被使用者淘汰的危险,因此有必要研究语言交融的客观情况,辩证地对待语言交融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寻找语言丰富发展的规律。语言研究的开展和语言政策的制定都应尊重语言生活的客观事实,以便语言工作兴利除弊,促进语言的健康、良性发展。

语言接触是产生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语言交融应从语言的变化入手,研究由于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各类直接或间接的借用、吸收、渗透现象,寻找语言交融的规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解释语言发展变化的模式,服务于语言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语言交融研究涉及文字学以及语言学的多个分支学科,它需要本体语言学对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的描写和分类,以及文字学对文字的描写和分类;需要历史语言学对语言发展的历时研究成果;需要比较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对语言间差异和共性的研究成果;需要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的地理和社会分布、接触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需要认知语言学对语言认知模式的研究成果;需要应用语言学对语言教学、语言政策、语言规范的研究成果。因此,语言交融研究具有多学科性,需要历时和共时、横向和纵向、宏观和微观、定性和定量、交叉比较和综合分析等多种研究方式。

由于现实中语言接触的情况十分复杂,现存的一种语言中都或多或少地会保留语言接触的三种不同结果,或者在其发展史中经历过三种不同的阶段,但在一个特定时期的语言接触通常会有一种主流形式或处于一种主流的阶段。例如现代汉语中有来自多种语言的借用成分,吴、闽、粤方言中

有皮钦语词汇存在,闽方言中还有古壮侗语、古苗瑶语底层,粤方言中还有古百越语底层。但目前总体来看,语言交融是现代汉语与外语、少数民族语言的主要接触方式,也是其标准变体(standard variety)普通话^①与方言的主要接触方式,只是交融产生的相互渗透和借用程度存在差异和不对称。

汉语与其他语言及普通话与方言交融中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汉语吸收外语(主要指英语)多,非毗邻的外语吸收汉语少;少数民族语言吸收汉语多,汉语吸收少数民族语言少;方言吸收普通话多,普通话吸收南方方言少,吸收北方方言多。语言交融上的不对称性反映了语言的强弱对比关系。通常来说,强势语言(powerful language)会更更多地“渗透”(主要是被借用)到弱势语言(weak language)中。语言交融中的不对称性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不平等,以至于引发不同程度上的语言冲突(language conflict),即语言地位上的竞争。

汉语及其标准变体普通话在语言交融中具有双重身份:相对于英语这样的强势语言,汉语是弱势语言,而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又是强势语言。普通话与外语和方言间也存在相似的关系。那么,以什么样的语言观(language belief)和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来看待和评价语言交融?以什么样的语言标准来衡量语言交融?以什么样的语言政策来规划和指导语言交融?以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语言交融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都会对我国语言生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系统地研究汉语及其标准变体双重身份的特点以及内部、外部影响因素。

① 变体(variety)包括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徐大明等,1997:79)。汉语普通话来自明清以来的官话,是官场、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社团方言。分布在台湾的普通话称为“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规范普通话的原则。对普通话的称法不一,常见的有“标准语”“共同语”;因其兼有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的特点,有的学者又将之称为“标准方言”。考虑到普通话的使用还与语域、语体、语境相关,有功能变体的特点,故本书采用“标准变体”这一说法。

第三节 语言交融的哲学透视

一、哲学影响下的语言研究传统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love of knowledge, wisdom; philo—“loving”+ sophia—“knowledge, wisdom”),指“对知识和智慧的爱好”。在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产生、发展、相互关系,及其与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都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七艺”^①密不可分。古希腊形成了两种语言研究的传统,一种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对这两种观点用现代语言学术语可作如下对比(表1-2^②)。这两种研究传统的某些观点在语言学史的

表 1-2 西方古代哲学语言研究观念的两种传统

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	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
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	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
语言是向人谈论事情的手段	语言是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手段
语言是一种活动方式	语言是一种判断方式
注意不规则现象	注意规则现象
语言学是描写的	语言学是规范的
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	关心语义与真值的关系
语言是选择系统	语言是规则系统
对话语作语义解释	对句子作形式分析
把可接受性或用途作为理想化标准	把合乎语法性作为理想化标准

① 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包括文法(Grammar,含文学)、修辞学(Rhetoric)和辩证(Dialectic)“三艺”(trivium)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四艺”(quadrivium)。七艺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把学科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初级科目包括体育(游戏和若干项运动)、音乐、舞蹈和读、写、算;高级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这一体系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罗马学者 M. T. 瓦罗曾拟订过一份学校课程方案,其内容除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及音乐外,还有医学和建筑学。至 4 世纪时,七艺已被公认为学校的必修课程。

② 转引自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 页。

发展过程中时分时合,常常交织在一起,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不同学派当中,再加上从自然科学中引入的各种实证主义方法,便构成了多元的语言研究方法论。

二、哲学发展的转向与语言观

西方哲学的发展由于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而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特点,即(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和(20 世纪)语言哲学^①。而在不同哲学背景下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观。

作为古代哲学经典的希腊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因为它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在希腊哲学里,通过思维作哲学论证、思考和推理,但是在这种思考和推理中,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思维也是存在的,因此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古代哲学只认识现象,一切都是包括在现象之内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所认知,但是不能以理智的、认识的方式认知的存在物。与这种本体论相对应的语言观主要是工具观和符号观。

最早的语言工具观产生于古希腊。在探索意识与世界的希腊哲人眼中,语言是思维工具,语言分析、哲学思辨、逻辑规则交织在一起。在古罗马,拉丁传统语法(即文法)一直被作为读写和口头交际的工具,始终处于中世纪的“七艺”之首。中国古代也有对工具观的描述,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也就是说名称本没有对错之分,统治者以命令来确定它,老百姓形成习惯了就是对的,不合规约就是不对的;《说文·叙》阐述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见,在当时语言文字被看作是解经—求道—统治的工具。

^①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范畴指不分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对语言的系统思考都可归入“语言哲学”的名下。狭义范畴特指 20 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语言哲学”。

最早持语言符号观的斯多葛学派^①,他们把语言作为客体,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把语言与建筑、绘画、雕刻、美术、舞蹈、音乐等其他一些作为客体的符号系统平行起来(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9)。斯多葛学派区分了形式和意义、能指和所指(Robins,2001:21)。索绪尔则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符号系统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把语言作为结构形式,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所结合的两面实体(entity)而不是抽象事物,语言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语言的形式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语言的本质是体现价值和由价值规定的形式体系,价值是具体实体或者现实单位在语言系统中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或所处地位(Saussure,1959:65—70,102—104,107—122)。英国语音学家琼斯,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代表人、丹麦语符学(glossemantics)奠基人叶尔姆斯莱夫等,大致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语言主体——人的存在使符号系统观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够完备。首先,主体可以有语言形式的思维,但并不一定使用声音或文字的结构形式或符号系统,这种内部语言是抽象事物而不是实体。其次,持符号观的学者认为语言任意性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之分。他们认为不同语言的存在证明前者;而把派生词、复合词解释为后发展起来的语言可论证性,属于后者;只有拟声词不是任意性的,但数量极少。然而对语言临摹性(iconicity)^②、同构(isomorphism)^③等非任意性的研究表明语言与人类认知和思维之间有客观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是由语言主体的主观性所产生的。

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特征是哲学家们意识到思维与存在是一个综合体: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对立,另一方面双方又有本质上的结合,即统一。认

①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在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由 Zeno(公元前 315)所创立的斯多葛学派(Stoics)。这一学派的研究领域一部分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但在哲学和修辞学的某些领域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方法和学说,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段,具有不规则特征。

② 参见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5—145 页。沈家煊译为“象似性”,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73 页。

③ 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92 页。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0 页,第 73—116 页。

识论阶段既肯定了思维、主观性与存在、客观性之间的对立,又肯定了思维、主观性与真理(通过思维所形成的认识)、客观性的统一,这样就形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与这种认识论相对应的语言观主要有功能观、行为观和能力观。

与索绪尔同时代的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指出,语言不像动物一样有独立的存在,语言不是有机体,“语言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功能”(Jespersen, 1922:7),“语言不是实体,不是成品,而是一种行为”(1922:56),所以语言是和人联系着的,是人的一种属性。基于对语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功能观和行为观以不同方式把语言主体纳入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语义这一主体的尺度去考察形式,以一定意义的形式单位来切分语言,以语义关系或言语行为结果来衡量形式单位,以功能或行为来确定价值。功能语言观认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以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音位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等都是持功能观的主要学派或学者;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以塞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是行为观的主要代表。以乔姆斯基为奠基人的转换生成学派是能力观的代表,他认为儿童在语言上显示出的“创造性”是经验主义的(洛克)“白板说”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都解释不通的,因而提出“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把“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一套“转换规则”转化为“表层(句法)结构”^①;并和莫里斯(Morris Halle)一起提出了一套生成音位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则。

认识论哲学不仅以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为其中心问题,而且试图在人的认识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即建立一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②,因而又再现了古代本体论形而上学所遇到的同样的内在矛盾:认识的

① 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区分很可能是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 J.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这一区分的影响。

② 康德的“导论”和“三批判”为建立这种“未来的形而上学”鸣锣开道,经验主义者试图在“感觉材料”或“经验”的基础上重建世界本体,黑格尔试图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本体,而叔本华却把世界的本原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之上。